

“官话”与“民声”： 汶川灾后重建标语表述研究

赵 靛 付海鸿

[四川大学 成都 610064]

[摘要] 中国是标语使用大国,其标语文化和标语研究都较为发达,但灾难标语是前人未曾关注过的新类型。以汶川灾后重建200多条标语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总结灾难标语的表述特点,另一方面分析表述背后的社会变迁。通过将标语视为官方文件的固态呈现,可以观察到官方进入灾区向公众着力展示的工作重点,透视出灾区由灾难社会向正常社会转型中的变化,并揭示当地人身处于重建过程之中的实际需要与困难。

[关键词] 标语;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灾难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71/j.1008-8105(2015)05-0064-07

前言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两个月后,《四川日报》记者从现场发回报道:“成绵广高速公路沿线的两百多个广告牌一夜之间变成了抗震标语牌;地震时有‘生命通道’之称的成灌高速两旁至今仍有30多个抗震救灾标语牌挺立;当解放军、医疗队、志愿者源源不断奔向灾区,一条条形式多样的标语更形成了潮,汇成了海……”标语,这种长期以来普遍使用在世界各地的表述方式,在中国西南突然发生的灾难过后,迅速成为了一道独特而重要的文化景观。

中国本是标语使用的大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标语一直用作号召、宣传、动员、引导的手段,充当作联系官与民的媒介纽带。以往学者研究各个历史阶段的标语,如长征、文革、改革开放时期等,剖析官方政策指向;通过不同场域的标语分析,如政府、农村、医院、学校等,亦可观察社会文化特色。汶川灾后地震标语地大量出现,不仅成为前人未曾关注过的标语类型,而且为灾难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近十年来,重大灾难的发生吸引着人类学者的关注。1995年日本阪神地震,1999年台湾921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海地地震——当世界各地不得不面对灾难,反思重建之时,人类学以特定族

群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对于灾难的认识、适应和应对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将灾难看成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一种组成,探讨灾难所呈现出的深层社会结构,并强调地方经验与传统机制在救灾与重建中的重要价值。正如美国灾难学家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在2011年于西南民族大学纪念“5·12”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灾难与人类学”研讨会上指出:“灾难不仅改变物质的世界,而且导致时空与社会观念的挪位与重构。灾后人际关系的组合中,包括国家、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地方组织、当地人等多种群体,不同群体或个人的经验会对一个事件或过程形成不同的解读,这些不同形式知识间的整理和沟通,有可能决定灾后重建成败。”^[1]

因此,本文基于2010年沿汶川地震带收集的两百多条标语和实地田野调查,试图回应灾难人类学讨论的两个问题:其一,标语作为汶川灾后多元声音中的一种表述,在沟通“官话”与“民声”之间扮演着什么角色,保留下哪些记忆?其二,标语作为中国独特的灾后文化景观,体现出什么样的地方性,为灾后重建提供了怎样的本土经验?

一、标语表述的社会重建

川渝大学生“重走汶川地震灾区,见证岷江流

[收稿日期] 2015-01-30

[作者简介] 赵靛(1988-)女,硕士,四川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付海鸿(1978-)女,四川大学文学博士,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

域恢复重建”科考活动于2010年10月24日从成都启程,持续五天。行程沿213国道北上,经紫坪铺水库、都江堰、水磨镇、汶川、萝卜寨和松潘,抵岷江源,后自九寨—平武旅游线至绵阳,观新、老北川城,顺京昆高速返回。

依照上述路线,重建标语的收集采取三种方式:1.现场取样:利用摄影摄像方式收集沿途所见标语;2.访谈询问:通过访谈都江堰农发局局长、汶川县宣传部长、萝卜寨团委书记等政府工作人员,了解标语生产流程,并观察、询问沿途群众对标语的反映;3.网络资料:以标语、地震标语、震中和重灾区等关键词查找相关文献,补充背景材料。由于原始收集多为驾车拍摄完成,不可避免部分标语的遗漏或残缺,最终收集有效标语共235条,按照数量、形式、主体、内容四方面进行分类。

近六百公里的行程,以主要城市作为分界大致划为五段:标语数量在成都至都江堰28条、都江堰至汶川76条、汶川至松潘26条、岷江源至绵阳63条、绵阳至北川及北川遗址公园43条。不难看出,标语较多于都江堰至汶川、岷江源至绵阳两个路段出现;在平武古镇和北川新城,考察队曾遇见印象深刻“标语阵”,车行道路几乎全被红底白字的标语覆盖,每两棵间隔不到五米的道旁树每隔一棵便悬挂一条标语;北川老城与北川遗址公园集中了最大批标语,总数明显高于其它任何地方。标语数量的统计似乎暗示出一个大胆推测:即受灾程度越严重,标语使用越频繁,例如汶川、绵阳和北川较成都、都江堰及松潘周边明显有更多标语出现。

标语主要以钢架广告牌和布制条幅为主,配以建筑物喷漆、鲜花堆放等其他形式。形式的选择以受众习惯和制作成本为导向,因此高速公路沿途多广告牌,乡村小道多横幅,城市中心有鲜花堆放,而民间还有家庭对联、电线杆海报等起到标语性质的表达。

所有标语中,明确注有发布主体的共78条,占总数67%,发布者包括政府党委、职能部门、承办企业、援建地区等,剩余157条均未注明。访谈得知未注明主体的标语有几种可能:一是灾区基层组织经申请发布,二是当地人出资发布,三是灾民即兴喊出或写下的情感话语。虽然这些自下而上的发言主体未被书写成文字,公开展示,但至少证明利用标语发声的权力不完全掌握在政府、公共机构手中,援建地与被援建地、村与村、甚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表达交流多少在标语中有所呈现。

具体到标语内容,大致可分两类:直接或间接与灾难相关的近180条,占总数77.8%,信息涉及重建、感恩、哀悼、新产业等。相比于2008年5月地震刚过,铺天盖地标语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渡难关”等泛泛而谈的成语口号^[2],灾后两年的标语增加了诸多明确所指,如“人生能有几回博,奉献热情筑水磨”、“安徽援建松潘高效蔬菜产业示范园欢迎您”等,这一时期的标语将重建的政策、对象、任务、情绪等用口语化的表达书写成文字,公开粘贴悬挂。地震过后,灾区的大众传媒(电话、电视、网络等)曾一度中断,部分较偏远的山区信息传递本来就不便捷,因此,灾后采用标语作为“醒目”的视觉宣传,有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另外一类与灾难无关的标语,占总数30%左右,内容涉及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义务教育、生态保护等,几乎与全国其它地区同步,显示出灾难社会向正常社会的转变。2010年正值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汶川地震沿线常见到如下标语:

妈妈,别忘了告诉普查员,我也是人口普查对象!(都江堰市区)

优生优育优教,利国利民利家(松潘县人口计生委)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性标语在灾区的出现虽然预示着基本的日常的秩序有所恢复,但灾区民众的心灵创伤尚需照顾,公共话语难免伤及个体情感。上文引用的这条“妈妈,别忘了告诉普查员,我也是人口普查对象”,在灾区频繁现率,不仅道出控制生育率的潜台词,而且反映了灾后人口变动大、普查任务重的事实。然而,这条由全国征集而来的优秀标语,在灾区看似“平常”地出现,却一次次令无数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或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心如刀割,标语中拟人化的一声呼喊“妈妈”,让灾难时刻失去亲人的苦痛一次次被唤醒,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与实际政策相悖。2008年7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允许省内数以万计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养育新的生命,以抚平灾难所带来的伤痛”。该决议在坚持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给予灾区适当宽松的生育政策,足以体现政府对地方社会缓步正常化的考虑与用心。若将此份用心落实到灾后标语地使用上,大概尚需兼顾地方社会普遍与特殊的双重面向。

在灾难社会过渡到正常社会的过程中,恢复重建是第一步,而社会转型则是第二步。20世纪50年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Oct.2015, Vol.17, No.5

代以前,人类学的研究常将灾难视为一种不可预知的“非常态”事件,以“普通日常”社会的恢复作为关注点,较少讨论灾难引发的社会断裂与文化变迁;20世纪60年代以后,灾难被看作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互动过程中的一种“常态”,虽然它难免造成了重大损失,但其本身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学者们倾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的互动过程中发展出一种适应环境和应对灾害能力,这不仅是文化得以持续的关键,也是社会发生变迁的动力,更是人类生存智慧的一种体现。”^[3]回到汶川的故事,灾后立刻有专家回顾日本阪神大地震的重建经验,提出“不能满足于恢复到震前水平,而必须是创造性的复兴”;“应将灾后重建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一个契机”^[4]。类似建议通过国家政策落实到地方,在地震带沿线的标语中显现出来,从中可见汶川地震灾区两年之间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生态环境、人民生活、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的变迁:

培养新市民,倡导新生活,建设新家园(汶川)

服务汶川经济,争取恢复重建新胜利,创造生产经营新辉煌(汶川)

灾区一片“新”景,沿考察路线的居民住宅区拔地而起;萝卜寨的羌族人完全从坍塌的旧村落搬入格局相似的新住房;汶川、北川的现代小区规划有序,水、电、煤气完全开通;水磨镇不仅完成重建,还建成了配套的AAAA级景区、阿坝师专新学校、纪念馆、商店、饭馆、雕塑等。在震中映秀,因地震失去亲人以卖羌秀为生的妇女说:“现在好些了,每天卖点东西就不太想难过的事了”。按都江堰农发局官员在汇报重建进度的话说:“恢复重建已基本完成,现在进入提升重建阶段”。

多彩猕猴桃,让世界共享成都的味道(都江堰猕猴桃生态园区)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示范基地,西天部落第一藏寨(松潘,国家科技部,西南交通大学旅游学院)

利用重建契机,灾区各地着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尤其是对口援建政策的实行,很多地区能够直接利用国家资金,快速引进东部、中部的人才,学习援建单位先进技术,发展出一流的示范性园区。

中国首座遗址剧场——道解都江堰(都江堰)

建美丽新家园,走科学发展观,发展旅游经济,建设美丽汶川(汶川广场)

扎实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奋力建设国际旅游胜地(松潘人大常委)

建设防灾减灾示范区,打造现代抗震博物馆(映秀)

灾区的经济结构也在重建中发生变化。过去四川主要依靠地方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如白酒、磷矿)、“三线”建设时期的军工产业及“外资西移、东资西进”的新能源产业等,重建后第三产业受到重视,尤其是旅游资源的重新开发以及以地震为主题的景区构建成为新的经济关注点。

向历史承诺,为子孙造福,重现古羌王遗都风采(萝卜寨)

大禹故里,熊猫家园,羌秀之乡,震中汶川(汶川)

打造大禹文化产业品牌,构建人爱尚善精神家园(汶川)

震前很少被关注的少数民族文化在重建时被大力保护和发扬。考察所经的水磨镇以羌族文化为元素打造成旅游地;萝卜寨获得羌族文明保留最古老、最完整的“云朵中的街市”之美名;汶川极力打造“大禹故里”和“熊猫家园”两条九环线文明走廊等——大概凭借地震和重建才让更多的人知道“汶川”及其沿线的文化。因此,县政府趁热打造“大禹故里、熊猫家园、羌绣之乡、震中汶川”四大旅游品牌,甚至有不少滥用羌族、地震等元素的现象。

社会公德进我家,文明建设靠大家(都江堰壹街区)

告别板房生活,迈入幸福家园,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坚强自立,和谐入住(北川新城)

随着物质重建的完成,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影响,随之改变。例如,即将入住都江堰现代化小区“壹街区”的居民,在地震前他/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其实从小生活在乡村或山地,屋子是“接地气”的平房,屋外有大片闲散的空地,大部分时间以田间耕种为生。然而重建后,乡民们不得不立刻搬进公共的社区楼房,适应由社区、高楼、自来水、天然气、公共花园等组成的现代生活,甚至需要自找除种田以外养家糊口的城市工作、交纳社区管理费用等。以上变化看似微小,却在与当地人的闲聊中多次被提到。

经过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汶川灾后重建的历程在地震带沿线的标语中时隐时现。如果从标语展现内容与沿途考察所见中,已经可以看到灾难社会向正常社会的转型,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灾后重建并

非完全地恢复过去,而是带有文化冲击和断裂的社会转型。在国家、政府、学界、地方等呼吁“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一个集合旅游、文化、科技、现代性的全新的“正常社会”,尚且需要时间来融入民间,为当地人所接受。

二、标语呈现的“对口”关系

汶川灾后重建成效显著,很大功劳当归结于第一次采用的“对口援建”机制。该机制在传统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加入地方与地方之间“一对一”的联系,不仅体现于灾后标语的表述中,同时影响到中央与地方、援建方与受援方、地方与地方,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社群关系。

重建标语包含多个主题,如禁止、祈使、政策、号召、抒情(感谢、哀悼),其中最突出的是“感谢”主题,200多条标语中共有“感谢”话语共出现48次,可谓灾后标语的“主旋律”。“感谢”标语中比较常见的表达如“党恩惠民心,灾重情更深(萝卜寨)”、“灾后重建新家园,饮水思源感党恩(汶川博物馆)”、“特殊党费解急难,党恩党情记心间(北川新县城)”等。这些抒情对象是“党”或“祖国”的标语,大多使用没有实指的对仗与成语进行表达,“特殊党费”意为灾后兴起的以党员名义进行的捐款,而对政府政策和重建成效的感谢大多针对援建地方、省市、单位等具体对象,数目众多,生动好记。绵延三百公里的汶川地震线沿线,多个省市的名字相继出现在相应地段:

黄浦江岷江水水相融,上海都江堰心心相连。

(都江堰市)

向大爱无疆的广东人民致敬!(水磨镇)

人生能有几回博,奉献热情筑水磨。(广州佛山市对口援建工作组)

安徽情似九天雨,沐浴松潘万千民。(松潘政府)

河北恩人,您们辛苦了!(平武县人民政府)

从感谢国家中央,变为感谢省市地方,是汶川灾后感恩标语的一大特色。公开发布地区对地区、乡镇对乡镇、村落对村落、人群对人群的感恩话语,既是对以往格式化、空洞化标语的革新,也证明“一省帮一重灾县”对口援建机制的有效,同时,“对口援建”有可能成为影响灾后四川省内、外社会关系的一项因素。

汶川灾后十五天,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做出重要部署,其中一项措施是“建立和完善对口援

建机制,实行一省帮一灾区,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5]。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法案》,明确指出要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由东部、中部的19个支援方省市,即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北京、辽宁、河南、河北、山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天津、黑龙江、重庆、江西、吉林,援助四川18个受灾县市,有北川县、汶川县、青川县、绵竹市、什邡市、都江堰市、平武县、安县、江油市、彭州市、茂县、理县、黑水县、松潘县、小金县、汉源县、崇州市、剑阁县。根据受灾程度不同,援建方与被援建方合理搭配,援助时限为三年。

政策出台后,媒体报道纷纷关注:“连日来,各省省委书记、省长频频访川,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对口支援的灾区民众重建美好家园”^[6]。北川县由山东省援建,省长提出“要把北川作为山东的一个县来重建,把北川人们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到达绵阳的山东副书记则说“9300万山东人民心急如焚,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你们需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北京市援建什邡市,为此政府压缩公共经费的10%,涉及154个部门预算单位和1130个基层预算单位。黑龙江省规范捐款捐物的使用;河南要争取三个月内为江油安装9万套过渡安置房;天津在原定的8万套活动板房基础上又增加了3万套;湖南从经济、人员、技术、设备、项目等多渠道进行综合援建……媒体观察到的“对口援建”似乎更像一场援建省市之间的实力竞赛,然而过分强调援建方的主导作用,多少忽略了国家意志与受援地方的能动性。在国务院第一次针对单一灾难进行的立法《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第一条原则即为“受灾地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与国家支持、对口支援相结合”,明确划分出国家、地方、援救方的三者职能,地方为主,国家与援建方为辅,而在具体实践以及灾区标语的表述里,似乎显现出强于“国家-地方”纵向关系的“援建方-受援方”横向关系。

在重建灾区确实可以看到,都江堰的“壹街区”被建成了上海风格的弄堂,都江堰人在接受访问时半开玩笑的说着“阿啦”;水磨镇中心塑起了三米多高的广东黄飞鸿塑像,羌族风格的建筑内播放着“爱拼才会赢”的粤语歌;松潘道路多以安徽地名命名,在安徽松潘藏族元素也为旅游业所利用;福建人才招聘会以宽松的条件在彭州举办,彭州劳动

力开始向福建输出;北京学校邀请什邡学生进行短期交换,西部农村的孩子第一次有机会看看中国最大的都市的模样……假若暂且不论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建立的利弊影响,至少“对口援建”机制作为官方组织,民间确认的“一对一”赈灾范式,已经突破了以往党和国家为主大包大揽的救灾手段,有效调动起东西部各地区的人力、物力等资源重组,较1998年长江洪水和2009年南方雪灾的赈灾更加有效。另一方面,四川省内、外社会关系也随之变化,省外援建方与省内受援县建立起密切合作,省内各地区之间因为受援方实力、政策的差异而显出成果的不同。

然而,灾区当地的民众,由于身处在国家、地方、援建方、受援方、媒体,以及NGO等多重关系网络之中,事实上很难表达出切身需求与应对灾难的本土经验。例如西南民族大学肖坤冰观察到:四川本为中国西南多族群共存的地区,由于灾后中央在重建法规中多次强调对羌族文化的保护,致使以汉族为主体的援建单位滥用羌文化元素,羌族的身份在灾后情境中凸显,藏族则利用宗教进行自救,而回族在灾区“一视同仁”的救济方式中只能依靠各地穆斯林自发组织的清真食品度过难关。^[7]类似的故事及其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改变,恐怕是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援助没有顾及到的,在标语中自然未能展现出来。

三、标语承载的集体记忆

汶川地震带沿线在对口援建三年任务结束后基本恢复,然而“地震”渐渐烙入集体记忆之中,通过公共时空内标语的形式被长久地保留,产生出仪式效果。

如果将灾区标语看作传达社会信息的载体,那么同一时空下“地震”相关记忆大概可划分成三种:其一,红白色标语所在区,集中于重建新城,表达感恩、建设、希望之情;其二,棕白色标语所在区,散落于河流、公路沿线,作为中性指示地震遗址之用;其三,黑白色标语所在区,隔离于北川老城即地震遗址公园内,寄托哀悼、怀念、追忆之思。随着灾后社会的重建与恢复,红色标语将迅速减少,被全国性的日常标语所取代;棕色标语成为旅游广告,吸引游客猎奇目光;惟有黑白色标语,虽然被定格在有限的空间内,却发出了同外界“粉饰太平”不同的“忧患人生”的声音,提醒来者这里曾经发生过如此巨大的灾难^[8]。

考察车队顺着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下,山谷底部的北川老城静静地保持着5·12地震刚刚席卷而过的模样。山路两边,蓝天绿树野花已展现出一派生机,偶有蓝底白字的标语牌在提示“靠近园区,保持肃穆”,立刻将遗址公园的气氛与自然鲜活的环境拉开距离。公园入口的标语牌体积硕大,背景配合祈福蜡烛的图案,写到:“献出你的一份爱心,还逝者永远的安宁”。一旦步入老城,地震遗址公园定格在地震发生时的瞬间,扭曲的街道被改造为环形观光路线,伸手可及的灾后城区触目惊心立在前,建筑或倾斜入地面,或破败得不见原型,惟有整理在一旁的门牌标示出“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北川羌族自治县林业局”“中国交通运政”等,眼中破坏的学校和居民楼仅有旗杆立在坍塌的水潭里,失去窗户和门板房间一片漆黑,屋外的空地上已经长出杂草和野花。大型黑、白色调的标语密集地出现在遗址公园内,经统计共18有条,如:



沉痛悼念5·12遇难同胞。(北川遗址公园)

加强老城遗址保护,告慰地震遇难同胞。(北川遗址公园)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北川遗址公园)

敬畏自然,保护地震遗址;珍爱生命,重建精神家园。(北川遗址公园)

地震无情,美丽北川成炼狱;人间有爱,羌族儿女正重生。(北川遗址公园)

这些标语,有的强调遗址保护是后代的责任,有的提醒保持安静给逝者安宁,有的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深深哀悼,有的提倡忘记伤痛浴火重生……严肃氛围中,震后两种强烈的情感交织轰鸣:哀痛肃穆的一方,永远保留对逝者的怀念与对自然的敬畏;

乐观积极的一方,则倾向于从灾难中汲取经验,用现场警醒、鼓励后代。

北川遗址公园内的标语,大概与传统理解中的“泛滥化”、“公式化”、“口号化”标语有些差别,它们担当起记录和表述历史的角色,同地震的时刻、坍塌的楼房、掩埋的尸骨一道构成了特殊时空中的集体记忆。正如中国传统中有为死者“树碑立传”的习俗,灾难中黑底白字的标语也许更像纪念碑,“通过物化可视的媒介把死者的生命意义符号化”^[9],标语公布的口号如刻在石头上的碑文,既是对死者的彰显,又表达了立碑者对于相关事件与人物的评价。自地震发生后,每年的5月12日被定为国定“哀悼日”,全国各地在“5·12”地震发生时间13:58分鸣笛三分钟,遗址公园作为老城区居民亲属就地掩埋的“墓地”,只为他/她们开放。这一天,从地震伤痛走出来的人们会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带上一束菊花,或半瓶小酒,在记忆中亲人遇难的地方进行悼念。在细心人的记录中,一个小孩曾在遗址中间钢筋条上系上白布,留下黑字书写的“想念你妈妈,女儿某某某”。

当国家与民众利用遗址公园进行悼念的时候,已有学者关注到灾难作为仪式意义与历史记忆的内涵。南京大学范可指出“现代国家热衷于把一些曾发生特殊性灾难的场所见构成仪式性的场所,通过参与者在仪式中的情感升华,达到油然而生的一股凝聚力,以强化原有的某种政治、文化或者社会认同”^[10]。从这个角度看,北川遗址公园中的标语无疑是官方话语中的一种,利用灾后民众共同的恐惧和善意,凝聚人心。其次,范可提醒“任何历史记忆都有官方与民间两个版本”,当标语表述的地震成为集体记忆的一个故事,“官话”之外那些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群体的声音便更加值得关注。

四、结论

灾难人类学将灾后社会暂时性的凝聚称为“灾后乌托邦”^[1],其间社会中会出现许多利他的行为,个体的私有观念会暂时终止,社会差别会消弱,团结与整合的意识得到加强。然而,随着外援的到来与重建的完成,社会阶层将重新划分,多元的声音再次响起,“官话”与“民声”是本文观察的两大声部。“官话”包括多重结构,如官方文件、领导讲话、主流媒体、标语和博物馆;“民声”来自模糊的大众,社会组织的观察或跨学科学者的涉入。

灾后标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官话”构成灾区政治话语空间的组成部分,影响着灾区的文化生态形成和社会演进。透过标语可以观察到灾区正经历从“灾难社会”向“正常社会”的转型,物质空间基本恢复,地方特色产业应运而生,灾难作为集体记忆发挥着凝聚人心的作用,重建的社会关系之中地方与地方的互助合作显出价值。通过标语所在区的田野调查与访谈聊天可以了解,除了自上而下的标语动员,民间同样存在自下而上对于标语的回应,有力的赈灾得到广泛好评,而政策疏忽导致的标语表述遗漏也引发社会其它力量的关注。在汶川灾后,标语实则扮演着沟通“官”与“民”的中介角色,而作为中国社会特有的文本,标语是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表现出汉人社会应对灾难时所持有的态度,值得开展更近一步的研究。

注释

张珏娟:《地震标语背后的故事》,引自四川日报网
<http://sichuandaily.scol.com.cn/2008/07/18/20080718706455941127.htm>。

《四川日报》记者张珏娟等人的灾后报道中也提到小学生自发表语感谢救援队、老教师将抒情民谣贴在电线杆上的故事。引自四川日报网<http://sichuandaily.scol.com.cn/2008/07/18/20080718706455941127.htm>。

《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政策:子女丧失劳力夫妻可再生》,引自人民网<http://acftu.people.com.cn/GB/67579/7569956.html>。

考虑海南省的实际情况不作安排;同时考虑重庆市是直辖市,且与四川的历史联系,西部地区安排重庆市承担对口支援任务。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8〕5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6号.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2008.6.4.

总体而言,灾难不可避免,但“粉饰路线”对其采用的是回避与掩盖,“忧患路线”则是直面和警醒。引自徐新建:多难兴邦与灾难记忆——地震展馆中的文化重建.《中外文化与文论》(2010)。

标语口号既多且滥,就不免落了套子,不免公式化,因此然人们觉得没有份量,不值钱……标语口号虽然要感情激动,但不该只有情感的爆发……标语口号有时竟用来装点门面,由当事人随意写写叫叫,只图个好看好听。其实这种言不由衷的语句,只是口是心非的呼声。参见朱自清:《论

标语口号》,载《知识与生活》,三联书店(1984)。

雨婷:《走进北川地震遗址》,故事引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224e50100pz1z.html。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奥立佛-斯密斯. 风暴中的声音: 救灾与重建中的社会关系[J]. 彭文斌, 译.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07): 1-2
- [2] 宋明. 国家印痕——2008年汶川标语集[M].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 [3] 张原, 汤芸. 面向生活的灾难研究——人类学灾难研究及其学术定位[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07): 13-17
- [4] 林家彬. 阪神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及其启示[J]. 城市发展研究, 2008(4): 14-17+29
- [5] 一省帮一重灾县[N]. 人民日报, 2008-5-29.
- [6] 初雪. 对口援建: 中国式赈灾[J]. 四川党的建设: 农村版, 2008(08): 12-13.
- [7] 肖坤冰.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8(07): 21-24.
- [8] 徐新建. 多难兴邦与灾难记忆——地震展馆中的文化重建[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0(01): 2-17.
- [9] 王晓葵. 刻在石碑上的日本[N]. 南方周末, 2007-10-11.
- [10] 范可. 灾难的仪式意义与历史记忆[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1(3): 28-39.

Official Discourses and People Voice: Th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f Slogans of Wenchuan Earthquake

ZHAO Liang FU Hai-hong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of slogans. The culture and study of slogans in China is well developed. However, the slogan concerning disasters is a brand new area.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more than 200 slogans collected from Wenchuan after the terrible earthquak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narrative character of the disaster slogans and analyzes the social change behind. These slogans provide a perspective to view the main point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like to show to the public, that is the changes duri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isaster area and the needs and difficulties for the local people.

Key words slogan; Wenchuan earthquak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disaster anthropology

编辑 邓 婧